

中国竞技体育社会责任历史回顾与当代审视

郝家春

(中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 武汉 430074)

摘要: 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 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 分析中国竞技体育社会责任的历史变迁。研究表明: 社会责任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中国竞技体育社会责任不尽相同, 主要涵盖政治责任、国际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以及道德责任; 中国竞技体育社会责任历史变迁折射出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 也反映了竞技体育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利益诉求的多样性;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提升中国竞技体育社会责任的自觉意识与践行能力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应然选择。

关键词: 体育管理; 竞技体育; 社会责任; 历史变迁

1 前言

竞技体育在倡导参与竞争的同时, 不仅要遵守体育比赛规则, 还要关注新兴国际规则, 竞技体育社会责任就是其中之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责任意识觉醒, 社会责任已由狭义的企业实体, 逐步扩展到广义的组织领域, 即一切社会组织都需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符合价值和社会期望的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的总和”^[1]。可见, 社会责任是指个体或组织应该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主动地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以实现个体、组织以及社会的“共同福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本文所指的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对竞技体育的组织、生存和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主体。结合责任理论, 我国竞技体育社会责任主要涵盖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道德五个维度。需要指出的是, 竞技体育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会表现出一定的流变性和差异性。

2 中国竞技体育社会责任历史回顾

2.1 建国伊始, 还权于民, 竞技体育肩负政治与文化两大社会责任 (1949-1965年)

建国伊始, 百废待兴, 中国竞技体育已经严重脱离国际体育发展。在此阶段, 政治责任和文化责任是摆在新中国竞技体育面前的两大紧迫任务。政治责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还体育权利于百姓”。这个时期竞技体育的利益相关者还比较单一, 主要是政府和普通百姓。建国伊始国力羸弱, 物质极度匮乏, 但这丝毫掩盖不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主、建设祖国的高涨热情, 体育也由过去的小众运动转变为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其实体育、教育、娱乐同八小时工作制一样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为之奋斗和争取的基本权利”^[2]。有学者^[3]对187个国家的成文宪法进行统计得出, 有74个国家将体育条款和体育权利写入宪法, 可见公民进行体育活动是行使自身权利, 理应受到法律保障。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政府关于“还体

基金项目: 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 (CSZ14004); 中南民族大学学术团队资助项目 (XTS15020)

作者简介: 郝家春, 男,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竞技体育、社会体育研究, E-mail: 834068817@qq.com。

育权利于百姓”的举措无疑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第二，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新中国一穷二白、物质匮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因此动员国民参与体育锻炼，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不仅是体育宣传，也是事关国家安全的政治动员。第三，体育为国家战略服务。为了应对国外压力与威胁，中国必须积极拓展国际空间，加强国际交流，争取国际理解与支持。此时体育便成为一种相对便利而又实用的手段和载体。通过主动参与国际体育比赛交流，在展示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同时，也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帮助。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为了粉碎体育领域“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毅然退出了国际奥委会，以体育的话语强烈表达了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坚定意志。在文化责任方面，主要体现在对国际先进体育文化的积极学习和主动创新，采取的主要举措有“三级训练网的建立”“优秀运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及行政管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等。

2.2 曲折动荡中竞技体育社会责任凸显（1966—1976年）

体育作为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它的功能发挥和价值体现必须依托既定的社会环境，体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社会进程和时代脉络。“文革”是新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曲折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竞技体育同样经历了浴火重生的洗礼。“文革”开始后，建国以来确定的关于竞技体育的一整套管理体制被废止，整个训练和比赛体系完全崩溃^[4]。由于体育依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激烈动荡，因此竞技体育失去了践行社会责任的支撑系统。1971年的“乒乓外交”则为命运多舛的中国竞技体育带来了盼望已久的曙光和良机。“乒乓外交”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破冰，“小球推动了大球”，我国竞技体育的政治责任得到了积极践行和生动体现。尽管“文革”后期，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再次跌入低谷，但是竞技体育战线的体育人始终怀揣梦想、不忘初心，正是他们的牺牲和付出，使得中国竞技体育在曲折动荡中的损失降到最低，这也为后来中国竞技体育重返国际、奥运争光蓄积了物质基础和精神财富。

因此，体育在我国社会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2.3 重返国际道路上竞技体育民族责任的体现（1977—1983年）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大系统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而作为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我国竞技体育步入了新的发展历程。1979年国际奥委会通过了《名古屋决议》，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同时解决了中国台湾参加奥运会的身份问题，这也是一国两制构想在体育领域的探索实践。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积极争取重返奥运大家庭，这正是“负责任大国”的生动体现。在政治责任方面，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管理体制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与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相结合的中国式单一制国家结构在体育领域的意志体现和制度延伸。作为社会大系统的构成要素，中国竞技体育必须服务于民族利益和国家需要，因此中国拒绝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在文化责任方面，虽然我国重返了奥运大家庭，但是许多项目的竞技水平与国外差距较大，因此在普及的基础上侧重抓提高，侧重抓提高是指省以上体委的工作重心是快速发展竞技体育，为奥运争光服务。

2.4 奥运舞台上竞技体育对国力和国运的诠释（1984—2008年）

如果说前面三个阶段是我国竞技体育思考、借鉴、蓄力阶段的话，那么从1984年开始，中国竞技体育进入成果检验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在借鉴国外体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发展竞技体育的理念、方式和手段也产生了变化和调适。与此同时，竞技体育所承载的利益诉求也日趋丰富。政治责任方面，洛杉矶奥运会后，中共中央首次以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对中国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邓小平同志曾说：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5]。可见，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这也凸显了竞技体育独特的政治功能。国际责任

方面，如果说重返奥运大家庭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应然权利，那么申办奥运会则是中国竞技体育践行国际责任的应尽义务。文化责任方面，现代竞技体育文化形态日新月异，不断带给受众以视觉盛宴和精神享受。中国竞技体育在与世界接轨与交流中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文化创新的责任与使命。统计显示，1984-2008年中国参加了七届奥运会，共获得386枚奖牌，其中奥运金牌163枚。经济责任方面，随着商业元素的不断介入，体育赛事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而商业包装和市场手段则是体育赛事的重要推手，竞技体育的经济价值得到逐步开发。道德责任方面，道德责任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现实性，即道德责任是依托在一定社会实践之上。在此意义上，道德责任是一个历史范畴。竞技体育道德责任作为道德责任的一个微观领域，它的发展变化自然受到社会大系统的制约和导向，为国争光一直是中国运动员努力攀登的道德高地。随着我国在奥运舞台上树立大国雄风，展现大国英姿，体育成为彰显国力和突显国运最完美的诠释。

3 中国竞技体育社会责任当代审视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的“当代”是指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至今的发展阶段。“北京奥运会无论在我国体育史上还是世界体育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必然发生变化，有人说成‘转型’或‘拐点’”^[6]。后奥运时代中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提升竞技体育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更好地回报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和期待。

3.1 国际责任：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交融

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国际责任主要来源三个方面：国际法定义、自我定义及他方定义^[7]。三者内容上既有重叠，也有不同，甚至包含矛盾对立的内容，中国竞技体育国际责任也涵盖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国际法定义下的国际责任。《奥林匹克宪章》全面体现奥林匹克主义，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行为准则。自从1979年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以来，中国一直是《奥林匹克宪章》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践行者。习近平总书记

在2017年1月访问国际奥委会总部时指出，北京是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这是中国的贡献。其次是自我定义的国际责任。自我定义的国际责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表达，例如国家领导人讲话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时强调，中国政府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发展体育事业。第三是他方定义的国际责任，除了国际法规定及自我规定外，中国竞技体育还要时常面对外界定义、期待，甚至是污蔑、强加的责任。回顾中国竞技体育奥运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勇拼搏的同时，总是伴随着西方部分媒体的攻击、丑化、污蔑，奥运会与媒体大战总是同时进行。面对他方强加的国际责任，中国政府一方面要予以坚决回击，另一方面应该继续发展好本国体育事业，用实力和事实说话。

3.2 政治责任：体育强国与民族复兴的期望

体育（奥运会）属于国际关系中的低政治领域^[8]。体育的政治色彩淡，但是政治功能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申办奥运会的城市必须得到该国奥委会的批准，并得到政府和立法机构的支持。申办现代奥运会是一项异常繁琐、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尤其是随着反恐难度的不断增加，国家机器的强力保障尤其重要。根据《奥林匹克宪章》规定，运动员只能代表所在国家或地区。前三名领奖时升起所在国家（或地区）国旗（或会旗），奏冠军运动员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国歌（或会歌）。在奥运会开、闭幕式上总会齐聚数量众多的国家（或地区）领导人。时至今日，奥运会已经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在当代中国，竞技体育的政治责任就是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国家战略服务，为民族复兴服务。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看望索契冬奥会中国代表团时指出：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紧密相连。在中国竞技体育社会责任历史变迁中，不同时期的责任维度和内容不尽相同，政治责任却是贯穿始终。但是也要清醒认识到，中国竞技体育有其不能承受政治责任之轻与重，过轻，则失去发展的社会动力与国家支持，太重，则可能危及竞技体育发展规律与成长机制。

3.3 经济责任：市场收益与回报社会的意图

经济和体育都是重要的现代社会系统构成要素，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而产生了体育领域内的经济活动，成为体育经济的主要内容^[9]。由于竞技体育蕴藏着市场价值，所以吸引了多方关注与投入，竞技体育自然而然肩负起产生更多经济效益、回报投资主体的职责和使命。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中国竞技体育的经济责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是指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新经济业态，应该在转型发展、创新驱动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潜能。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在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的顶层设计下，应充分发掘竞技体育的经济价值和潜力，逐步把体育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新的、稳定的增长点。中观层面是指职业化、商业化背景下，竞技体育回报社会资本的市场期望。因此需要不断深化利益调解机制，提高预期收益，这是维系和增强社会资本投资动力的应然选择。微观层面是指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等竞技体育直接参与主体的物质帮扶与人文关怀。竞技体育已经成为“常青的朝阳事业”^[10]，而运动员、教练员则是推动这项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笔者认为应该建立国家层面的专项基金，用以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为中国竞技体育奉献过或正在奉献的运动员和教练员。

3.4 文化责任：文化使命与教育价值的体现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对体育有着非常敏锐和深刻的认识，他说体育不仅是体育，还能贡献更好的教育，让我听了非常振奋^[11]。可见，体育被赋予了文化使命和教育价值。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体育文化史诗，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充分发挥了“人为”的主动性与拼搏精神，也充分彰显了“为人”的教育性和文化价值。在当代化语境下，中国竞技体育的文化责任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在狭义层面，中国竞技体育的文化责任是指不断进行竞技项目的技战术创新。“走下领奖台就意味着重新开始”，这是中国体育界自我激励、不断超越的座右铭。在广义层面，自从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以来，中国竞技体育既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特

色体育文化的创造者和发展者。“珠峰精神”“乒乓精神”“女排精神”“志行精神”等这些不同时期涌现的优秀体育文化所蕴含的拼搏精神、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对社会各个领域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引领作用。

3.5 道德责任：教育引导与行为自觉的实现

道德责任没有强迫性，教育或引导的效果更为明显。这就是道德理论从训诫到劝谕的转变^[12]。道德责任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责任标准会发生变化。因此，一方面要客观理性审视当代竞技体育发展实际，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和引导，使我国竞技体育更好地践行道德责任。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国竞技体育应该加强以下两个方面的道德实践。一是维护健康良好的竞技体育社会形象。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健康良好的竞技体育形象对于改变和提升国家形象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价值^[13]。竞技体育形象已经成为人民日益关注的社会问题，同时它也成为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在里约奥运会上的精彩发挥和完美表现，中国女排受到全国人民的褒奖和赞誉。二是积极响应国家和相关组织发起的社会公益活动。客观而言，长久以来民众对竞技体育的支持与关注已成为一种定式与传统，而竞技体育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回馈与贡献方面还存在不足。相比较西方发达体育强国，中国竞技体育参与社会公益还处在起步阶段，尚未形成自觉行为。在我国现有体制下，作为运动员的管理主体，我国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应该积极鼓励和引导运动员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并利用自身独特优势发起体育公益活动，使得社会公益成为我国体育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不仅有益于受众近距离感受竞技体育的善举和责任，同时也有助于我国竞技体育道德形象的维护与提升。

4 结语

体育已成为我国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而竞技体育是体育领域中的高端资源，它对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起着导向和引领作用。因此，竞技体育被赋予的社会责任映射了时代发展和国家需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竞技

(下转第8页)

发展的作用。所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输出不仅要实现自身文化理论的自信与自觉,而且要创造与世界各种不同体育文化之间相互认同、互相尊重、互惠共存的和谐局面。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不仅要有源于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丰富世界体育文化体系,更应有源于中国且发展于中国的创新型体育文化,以符合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只有这样,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才能得以融入、引领世界体育文化并对世界体育文化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蔡莉.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与传播[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4,33(3):131-134.
- [2] 中国把功夫带向了世界,为何却把自己抛之门外?

[EB/OL].http://a.mini.eastday.com/html/2016/tiyu_0714/960423.html.

- [3]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M].张兰平,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48-50.
- [4] 王义桅,韩雪晴.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8):21-39.
- [5]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现状与展望[C]//第8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资料汇编.北京:中国体育科学学会,2007:304.
- [6] 彭业仁,陈慧娜.全球化、后现代与东方体育文化的复兴[J].体育文化导刊,2007(1):11-12.
- [7] 周忍伟,陈荣杰.中国文化导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18-67.

(编辑:鲍婷)

(上接第4页)

体育所承载的社会责任不尽相同,整体上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和功能必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和优化,中国竞技体育被赋予的期望和诉求也将更加多样和丰富,主要体现在:立足国家利益、服务社会需要、尊重个人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以及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型,中国竞技体育社会责任发展趋势将体现在:国际责任的担当;政治责任的优化;经济责任的凸显;文化责任的回归;道德责任的坚守。

参考文献:

- [1] 刁宇凡,周立军.社会责任标准导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154.
- [2] 谭华.试论体育的权利和义务[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4,10(3):13.
- [3] 陈华荣,王家宏.寻找宪法中的体育权利——各国宪法公民权利章节体育条款比较分析[J].体育学刊,2012,19(3):24-29.
- [4] 付砚农.“文革”时期竞技体育状况的阶段划分及理由[J].体育文史,1998(6):51-53.

- [5] 梁晓龙,鲍明晓,张林.举国体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18-19.
- [6] 谢琼桓.论北京奥运后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1,45(11):5-14.
- [7] 李东燕.从国际责任的认定与特征看中国的国际责任[J].现代国际关系,2011(8):52-57.
- [8] 刘丰.理解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评《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规范社会化视角》[J].世界知识,2011(4):69.
- [9] 沈克印.当代中国体育经济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21.
- [10] 张志勇,程卫波.当代竞技体育本真价值检视[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8):33-35.
- [11] 国际社会热议习近平主席访问国际奥委会[EB/OL].<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70120/30192731.html>.
- [12] 卢旭.责任建构与道德教育[J].教育科学研究,2010(4):61-63.
- [13] 易剑东.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形象塑造与媒体应对[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31(4):1-7.

(编辑:鲍婷)